

歷史與空間

張桂輝

選賢任能張居正

張居正 (1525—1582)，字叔大，號太岳。今年五月，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《暮日時光：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》一書，明清史學界元老、著名學者章慶遠，在他這本最新著作中，運用了大量罕見的史料，在充分肯定張居正偉大歷史作用的同時，對他的「失誤、失律和失德」的一面，也給予了實事求是的直書。

張居正四十三歲入閣、四十八歲為內閣首輔（明中後期相當於宰相）。他當國初期，正值嚴嵩父子崩潰之後，政治上混亂、腐敗，經濟上處於崩潰的邊緣。擺在張居正面前最棘手、無疑是經濟問題，尤其是如何增加朝廷財政收入問題。但在張居正看來，財政問題只是表象，改革面臨着更多的，是深層次問題。比如，庶官糜曠、吏治因循等「積弊」。長期以來，由於吏治不清，官場上充滿了各種形式主義，推諉、扯皮、虛飾等，更是屢見不鮮，成為官場常態。官員隊伍中，普遍存在的貪贓枉法現象，既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，更讓政令無法得以貫徹實施。面對這些問題，張居正較之其他一些改革家，不但更老練，而且更成熟。他深刻認識到，沒有一支過硬的幹部隊伍，再好的頂層設計、再好的改革措施，統統難以落實到位。

有鑑於此，張居正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，整飭朝綱、鞏固國防，重整吏治、選賢任能，使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，枯木逢春、重煥生機。得人才者得天下。張居正選人用人，最重要的一點，是不拘一格，任人唯賢；最核心的一點，是重用循吏，慎用清流。所謂「循吏」，用今天的語言表述，就是那種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，充分發揮主觀能动性，把困難拋開，把事情做好，讓事實證明、用結果說話的官員。至於「清流」，則是那些擅長於誇誇其談，唱功好做功差，說得多幹得少，滿腦子道德教化的人。在「循吏」與「清流」之間，張居正態度鮮明，毫不猶豫地啟用前者，毫不客氣地拒絕後者。這一點，從他對海瑞和戚繼光二者使用的不同態度上，便可窺一斑、得到佐證。

海瑞，故事很多，名氣很大。尤其是他抬着棺材向嘉靖皇帝上書進諫的事，幾乎婦孺皆知，可謂廣為流傳。事實上，即便在當年，海瑞就已經成為清官的「化身」。嘉靖皇帝去世以後，徐階把海瑞從監獄裡放出來。鑒於海瑞

的名聲，徐階決定重用海瑞——讓他到江南當了應天府巡撫，管轄南京周圍幾個最富有的州府。海瑞是個極具操守的人。上任之後，不坐八抬大轎，寧騎驢子上班。對此，一些部下，看在眼裡，氣在心上。原因明擺着，「一把手」只騎驢子上班，別人有誰還敢坐轎子？

然而，海瑞又是一個十分理想化的人。以斷案為例，但凡富人和窮人打官司，不管有理無理，一般都是富人輸；哥哥和弟弟打官司，大多是哥哥輸；強勢者與弱勢者打官司，大多是強勢者輸。如此一來，富人也好，大戶也罷，或擔驚受怕，敬而遠之；或腳底抹油，能跑便跑。結果是，州府的稅源沒了「活水」。不過短短兩年，當地賦稅減少了三分之二。海瑞不從自己身上查原因，卻認為「滿天下都是婦人」，以致憤然辭職。當時的首輔高拱，聽之任之，不予挽留。結果，海瑞就只好回到老家——海南瓊山——賦閒去了。

張居正任首輔之後，要求三品以上大臣，都要向朝廷推薦人才。其中，不少人推薦了海瑞。時任吏部尚書楊博，還曾就這個問題，專門游說張居正。然而，張居正不為所動，就是不予起用。在張居正眼裡，海瑞是一個有道德、善自律的好人，但好人未必就是好官。好官的標準應當是——上讓朝廷放心，下為蒼生增福。而海瑞做官，只有原則，沒有器量；只有操守，缺少靈活。因此，有政德，無政績。是一個典型的「清流」，不好使用，不能使用。

相反，張居正啟用戚繼光時，後者只是個總兵。那時，總兵雖是「省軍區司令」，可上面還有一個總督呢。總督，既是地方的行政長官，又是總兵的頂頭上司。以往，但凡總督和總兵產生矛盾，朝廷撤換的必定是總兵。這，幾乎成了「慣例」。張居正恰恰相反——不管他人如何攻擊、怎樣貶損戚繼光，抑或他和總督產生矛盾後，張居正始終對他信任有加，撤換的都是總督。不僅如此，每個總督上任時，張居正都會親做「任前談話」，明確要求支持戚繼光。正因此，戚繼光擔任蓟遼總兵十三年，蓟遼沒有發生一次戰爭，蒙古人也沒有一次進犯。辯證地看，這既是戚繼光恪盡職守的功勞，也是張居正知人善任的結果。

政因人興，事在人舉。孔子認為：「政在選臣」，墨子強調：「尚賢者，政之本」。兩人



張居正故居 網上圖片

表述不盡一致，大意相同，說的都是選賢任能的重要性。從萬曆元年十年，張居正政績斐然。他重用名將李成梁、戚繼光、王崇古等，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，只得安分守己而與明朝進行和平貿易。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，也都一一平定。國家富強，國庫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，庫存的盈餘，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支出。交通驛站，辦得井井有條；清丈全國田畝面積，使得稅收公平。經過張居正的苦心經營，明朝成為彼時全世界最先進、最富強的大國。

張居正是明代最有權威的首輔，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。萬曆十年(1582)病卒後，遵其遺囑，千里迢迢，發喪回鄉，歸葬故土。張居正墓園，亦即張居正紀念館，位於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首輔路16號。退休的第二年，我應邀在湖北《楚天消防》任「總編室主任」期間，曾參觀過張居正紀念館，這座佔地面積約10,000平米的紀念館，坐北朝南，主體建築分佈在南北一條軸線上，由儀門、庭園、半月池、張居正塑像、神道、墓碑、及純忠堂、太岳堂等8部分組成。神道兩側的石人、石馬、石羊、石虎兩兩成雙。庭園兩廂附屬建築東側為太岳書，堂內展出有張居正畫像、帝鑑圖說等珍貴文物及生平簡介；西側為純忠堂。園內亭、廊環繞，磚石鋪地，銀杏、香樟、松柏及梅竹等，枝繁葉茂，鬱鬱蔥蔥，其結構按明代墓葬等級制度佈局。整座墓園古樸典雅，莊嚴肅穆，是人們憑吊先賢、訪古探幽的休憩場所。置身其間，穿越歷史，一股對張居正肅然起敬的情感，不知不覺爬上心頭。

張居正有句名言：「世不患無才，患無用才之道」。各級領導幹部，應該具備識才的慧眼、用才的氣魄、愛才的感情、聚才的方法，知人善任，廣納群賢。時代不同了，社會進步了，我們理應超越張居正，努力開創人才輩出的良好局面。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，既離不開一套相互制衡的管理體制，更離不開一支廉潔高效的幹部隊伍。這，也算是張居正重整吏治、選賢任能給我們的一點啟示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《香港文學大系》緣起

新出的《文學評論》總第50期，有篇寒山碧〈關於《香港文學大系》的緣起與點滴〉的文章，讀後勾起不少感慨，深信一事之成，每歷經波折。迄今《大系》十二卷已出版，《導言集》也出了專書，《編後感》也將出版。一雞三味，應是香港文壇近年的盛事。

文章提到本世紀初，何志平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時，擬撥款300萬資助撰寫《香港文學史》，可惜只開機梯響。當年我們都認為盧璋鑾（小思）不出，誰與爭鋒？不久，陳萬雄代任文委會主席，曾極力推行此事。他的同鄉陳青楓走來告我，力邀書寫「通俗文學」一章，只因我被目為收藏報刊資料豐富也，而且從來沒「看輕」這些所謂「垃圾」。可惜，美事亦不知如何告終，得個諱字。

寒山碧文章中提及區區，所云亦是。他說在任藝發局文學組主席時，曾極力在局中爭取重續何志平、陳萬雄的提議；在每周六的茶局中，寒山碧念念不忘這事。有次選提及藝發局有筆撥款，可供有心人去完成這壯舉。誰人可寫？誰有資格？九七前，不少內地學者競寫香港文學史，但無一令人嘆服；有的大著還是鉅剪加漿糊的繡拼之作。我曾訪內地一學者，在其家中

時，問《人渣》可在此否，能不能借我出外影印。

他一聽，一愕，什麼「人渣」？我說在你的文學史中有提及呀。他一怔一醒，繼而哈哈大笑：「鉅剪加漿糊來的。」這位教授的坦坦蕩蕩，從來就為我所佩服。

這類香港文學史，怎不令人慨歎。寒山碧說，不寫「史」，編個資料集應可以吧。有次飲咖啡，他問我何人可任此艱難事業，我立馬推薦陳國球大兄，寒山碧立馬應承，我立馬打電話給國球大兄，卒之由我做「柴可夫斯基」，駕車直奔陳國球當年任教的科技大學。寒山碧說乘地鐵再轉的士，記錯了。

記得那夜在科大餐廳，三人共商此事，寒山碧說按程序要「招標」，但相信無人肯投，國球大兄有意為此，可扶一把云。

後來三人再吃一次晚飯，商討細節。事後我感到十分輕鬆，我這中間人終於幹成一樁好事，以後的事可與我無關了。想不到，國球大兄卻邀我主編《通俗文學卷》；再其後，還邀我出任編委。

寒山碧後來再不競選連任藝發局文委會主席，專心寫他的堆頭著作。然而，不當主席後，寒山碧落落寡歡，間中還慨嘆人不在茶亦不在，以前當主席時很多圍在他身邊的人，大都已「鳥獸散」了。我聽後每大笑，指他年記一大把，還看不透這世態。

《大系》逐卷出版後，我知他心中有結，於是囑《大系》研究助理告知國球大兄，應贈書給他也。寒文說二零一六年收到「贈書」，但沒「細看」；他是催生者，怎不「細看」？



2009年，寒山碧受聘上海同濟大學兼職教授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集體回憶：與「荷蘭」相關的用語

不同年代，有不同的集體回憶 (collective memory)；可能你不是同年代，但也可來感受一下他們的經歷，也許別有一番滋味。

「荷蘭」是其中一個最早進入中國商或侵佔中國的歐洲國家，所以凡是從「荷蘭」引入的東西，也在其名字之前冠以「荷蘭」二字，如「汽水」叫「荷蘭水」、「汽水蓋」叫「荷蘭水蓋」、「豌豆」叫「荷蘭豆」。



1876年，清人葛元煦在《滬遊雜記》中提到當時上海售賣汽水的情景：

夏令有荷蘭水，檸檬水，係機器灌水與汽入於瓶中，開時，其響爆出，橫彈彈中面目。隨到隨飲，可解散暑氣。

由此可見，晚清時期已有好一部分中國人接受這種「洋鬼子飲料」了。



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兄弟，相信也有過玩「荷蘭水蓋」的經歷——用槌子把蓋打平，有人在中央鑽孔玩旋轉，也有人做飛鏢。大家莫看輕這些小玩意，當中除具「創意」外，還蘊涵着「資源盡用」的概念。回歸前的香港政府和回歸後的英國政府，為了表彰一些曾對香港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，會頒予他們大英帝國勳章。曾獲此等勳章的華人有：「慈善伶王」新馬師曾；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；娛樂業大亨、慈善家邵逸夫；作家、慈善家鄧永鏞；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等。驟眼看去，「勳章」像個「荷蘭水蓋（飛鏢）」；又有人認為「授勳」只是「虛銜」，「勳章」猶如「荷蘭水蓋」，爛鐵一塊，一文不值，於是戲稱「勳章」為「荷蘭水蓋」。

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小童在不滿鄰居或同學因有小小成就而不可一世時，多會說以下一句佻皮話語，以示不屑：

飽死荷蘭豆！

有時也會在說此之前加上「好叻嘢」（很棒麼）來加強語氣。大人遇上類似情況，就會簡化的說「飽死」。於17世紀佔據台灣的荷蘭人把「荷蘭豆」引入台灣。及後，「荷蘭豆」也有在本地栽種，但不多。當時的「荷蘭豆」多數是入口的，價格自然比一般本地菜蔬為高。如此看來，當時有「荷蘭豆」吃的家庭可算「巴閉」。有些人因自恃有能力吃「荷蘭豆」而「招招積積」，

「巴巴閉閉」，旁人看得不是味兒。有人便連咒帶罵的、人或背後的說：「那吃荷蘭豆來個飽死罷！」

溫飽，人之所欲；得溫飽，人人羨慕，如因可吃得飽而致死，是一個極大的諷刺。後來在民間流傳了以下一句童謠：

飽死荷蘭豆，餓死芥菜頭。

後半部只與前半部遙相呼應，沒什麼意思的。

可能是「荷蘭人」的「毛」髮偏「紅」，被佔領時期的台灣人便叫荷蘭人做「紅毛」或「紅毛鬼」。有了「紅毛」這個稱號，所引進的水泥叫「紅毛土/灰」，廣東人則叫「紅毛泥」；所引進的男士超短髮型叫「紅毛裝」。



「紅毛裝」指在頭上留下吋來短髮，活像個飽魚刷 (Abalone Scrubber)，「陸軍裝」卻要剃至「見青」（看得見頭顱），「花旗裝」則指在頭上留下數吋頭髮（「花旗」是美國的俗稱，因為廣東人覺得該國國旗花花綠綠）。可以這麼說，「陸軍裝」過半個月成了「紅毛裝」，再過一兩個月便成了「花旗裝」（速度因人而異）。

台灣有以下一句與「紅毛鬼」相關的俗語：打劫紅毛鬼，孝敬法蘭西。

廣東的版本則是：打劫紅毛鬼，進貢法蘭西。

「法蘭西」是舊時台灣對「France (法國)」的音譯（「蘭」讀「蘭3-1」）。以中國當時的國力，是很難對抗「洋人」的。因此，從「荷蘭人」手上奪得財物不是輕易的事；可後來卻把這些來得不易的財物奉獻予「法國人」，亦即財物最終也是落入「洋人」手中，那強奪時所付出的心力是白費的了！大多數人認為這就是：左手嚙，右手去。【剛得來的又馬上失去】由於「不正當」是先決，所以以下一句才貼切：冤枉嚙，癩疫去。【ill got, ill spent】

【不正當途徑得來的也會在不正當情況下失去】當中帶有「不義之財無久享」的意味。話說回來，不是這個年代，哪會有這個經歷；沒有這個經歷，哪能把這些寫下來哩；一如正在「消失中」的粵語，亦只得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才會有那份熱情和能力去將之記錄下來。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絲路詩絮

我的小孫子法里斯出生在北京，今年八歲。他第一次品嚐北京烤鴨是在滿周歲那天，我們在住處附近的一家烤鴨店為他過一歲生日。回家路上，小傢伙被爸爸抱在懷裡，身上沾滿巧克力顏色的醬汁，顯得很開心。就是從那時起，我們家在小孫子的央求下，經常過「烤鴨節」。近幾年，北京烤鴨的價格漲了起來，但總的來說，大家還能接受，因為品質與從前一樣，誰能拒絕如此可口的美味佳餚呢！法里斯雖年紀小，卻學會了自己捲鴨餅，用小手把鴨肉片、切成細條的黃瓜絲和大葱絲蘸上巧克力顏色的甜麵醬，放在薄得幾乎透明的麵餅上捲起來，然後放到嘴裡，大快朵頤。他捲鴨餅的動作很專業，有條不紊，似乎很享受捲餅的過程。而且，他胸前

烤鴨節

掛着的小小餐巾總是潔白如初，一滴醬汁也不會沾上。幾年前，我的小孫女薩米婭和孫子阿明也加入了這個行列……

對很多中國人來說，烤鴨是一道美食，重要性如同手抓飯之於塔吉克人一樣，都需在特別的日子裡享用，或家庭聚會，或國家慶典，手抓飯是招待遠道而來中國客人的必備食品。人們都說，若是沒到過天安門廣場，沒登過長城，沒吃過北京烤鴨，那對中國的了解就不夠全面，此言不虛。

北京烤鴨是中國最著名、最「美味」的一張名片，如同手抓飯之於中亞各國一樣。與手抓飯不同的是，北京烤鴨沒法在家裡自己做。因為它需要專門的烤爐，當然還要有專門飼養，且備好的鴨子。但這兩道佳餚的共同之處是，一定要大家一起享用，

拉·阿利莫夫 (塔吉克斯坦) 黃玖譯

無論對美食家，抑或對這道菜而言，若一個人獨享，不啻是一種侮辱。北京烤鴨和手抓飯都極具魅力。你也許是國際動物和鳥類最熱心的保護者，抑或是最虔誠的素食主義者，但如果你吃過哪怕一次手抓飯，或是北京烤鴨，就一定夢想再次擁有這種美食的體驗。你的思緒將一再回到你品嚐這無與倫比的美味佳餚的時刻。那香味讓你難以忘懷，長久地，甚至終其一生都會浮想聯翩。手抓飯和北京烤鴨這兩道民族美食，無須做廣告已聲名遠播，只要地球上還有鴨子飛（雖然北京填鴨並非會飛的鴨子），還有稻花香。中亞各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一直都以熱情好客而聞名天下，真想邀請外星人來品嚐一下手抓飯和北京烤鴨，這一天不會太遙遠了。

2017年10月5日於北京

豆棚閒話

渴虹垂地吸長川

——范詩銀詩詞賞讀（下）

褚寶增 中國詩詞創作院 常務副院長

無論詩詞，開頭或日執筆極為重要。若能先聲奪人，攝人魂魄，豈有不讀至篇尾者。即李清漁在《閒情偶寄》中所說：「開卷之初，當以奇句奪目，使之一見而驚，不敢棄去。」范先生當然知此關鍵，知之復能踐之。如其《壽山溪·退思園》：「欲補天剩火墮晴窗，孰幾走層巒」，《月下笛·〈宏興詩〉序》其二：「馬路長風，風追去燕，碧穹何有」，《水調歌頭·七月七日全面抗戰八十年之北京雷雨大作有記》：「壯士幾多恨，忽作炸雷鳴」，《八聲甘州·雪夜有感》：「看雪飛雪舞又新年，天幕已重懸」，《鷓鴣天·丙申中秋賦得東風航天城月圓》：「有月於心常自圓，霜輪恰倚欄樓懸」，《一絡索·雨林籬瀑》：「曾與藍天約好，碧雲知道」，《人日立春有記》：「此生此日與春同」，《紅梅春箋》其三：「綠雲深淺抱輕寒」，《北戴河月歌》：「今宵明月舊相識」，《北雙調·清江引·神舟巡天》：「故鄉客來天細語」。

填長調詞時，思路要能展開甚至放射，想像要能豐富甚至浪漫，否則必成積石墓塚，徒具死形而乏生氣。此點，范先生可成正例典範，如《甘州·紅雲》：「是補天遺火，荒原餘燼，戰地煙旌」，《高陽台·黃旗海舊寨》：「濕紅霜葉斑斑淚，是當年、鐵血銅顏」，《古關》：「前去雲邊新築壘，雁聲不似劍聲濃」。再者填長調與小令有別，長調需首尾呼應，方可長而不懈，渾然一體。范先生之《永遇樂·北固樓步韻懷稼軒》詞足可借鑒，全詞起句「遺響繁欄，拍痕難問，稼軒憑處」與全詞結句「潮聲隱、新濕青碧，是君淚否」回轉相顧，致使全詞若龍捲風勢，嘯吒風雲。

作詩填詞，非僅憑才學生硬擠出，需憑作者豐沛的感情自然流出。值范先生六十有二的端午日，思及亦為屈夫子投汨羅江之年壽，慨然賦《金縷曲》一闕，酣暢淋漓，當與識者共賞，其詞曰：我亦如君老。若蒿萊、覆兮蘭蕙，香兮蒲草。逸語殷殷留長幅，還有幾多殘稿。幾回夢、難醒難了。博帶城心血漬，肝腸燙。湘波載月湖山曉。照影來、旋花激灘，翻鷗飄渺。浮濁回風寒煙白，可識青襟曾掃。又可識、春秋懷抱。且把清吟噴玉笛，寄流年、相約聽雲表。千滴淚，一聲嘯。作家成熟的標誌就是其風格已經形

成。不同的經歷，造就不同的性格，看問題會有不同的視角。范先生之《望遠行·忻口》，只因軍旅出身，方有鏗鏘大聲，亦當與識者共賞，其詞曰：黃花唱壁，沉雲過、洗略當年奇勢。彈痕垂拂，歲月堪憑，試問舊來誰識。漫嶺聞風，偏羨劍殘盤錯，猶着那時秋氣。更依稀、青髮丹心未死。

如是。環聖列雕降虎，踏血號、舞戈揚械。矢雨潑來，電光掠去，遑數鬼佬倭幾。應記英雄魂魄，男兒肝膽，不負軒轅青史。折一枝豐蕾，霜空遶塞。范先生所填長調，當今詩壇逾者甚少。每遇一題一闕情難抒盡時，往往同調同題數闕連出。像《鶯啼序》這樣的超長調，他人只偶為之，范先生是擅為之，且揮灑自如，令人艷羨。范先生諸體兼為，容在下斗膽為其排序，長調居一、小令居二、絕句居三、歌行居四、律詩居五、散曲居六。前四體如同野駝，瀟灑自如。律詩如隊列，被腦海中的口令約束，致使稍顯呆板。散曲缺了幾分「俏俏」，確也難為大校了。得與范先生相識，令在下又多一師，文中荒謬之處，望范先生不吝教我。